

香港華人商業：歷史和文獻

Exhibition on Hong Kong Chinese Business: History and Documents

一、引言

香港作為世界性華人商業和貿易中心，一直保持着兩方面的優勢。第一，與中國內地維持緊密的關係，中國的資金和商品的進出口，都要經過香港。第二，香港是華洋雜處的社會，西方的商業制度和知識，相對於內地而言，更容易與當地社會融合。香港於1841年開埠，隨後吸引了不少從廣東、澳門和華南地區，甚至遠至東南亞的商人來港經商。華人在香港營商已有170年的歷史。到底，香港華商有何歷史特色？香港的華人商業傳統又如何幫助華商的崛起？

過去學界對華人商業普遍有負面的評價，例如重視關係多過法律，強於網絡但弱於組織，華商認為信用比契約更為重要。換句話說，契約是需要個人信用來維持。香港於1865年推行公司法，比中國早四十年，但是華人集資並不依賴公司法，華商憑血緣、地緣、業緣關係進行「合會」、「合股」等資金籌集活動。當華商需要繞過家族的渠道進行集資，或須保護股東所承受的個人責任時，才會向政府註冊為有限公司。1939年時，全港有1134家註冊公司，其中301家為外資公司，130家為外資於內地設立的公司，華資公司有703家，比起三十年前增加只有一倍，數量並不多。

香港大學圖書館特藏部從1980年代初以來，即致力於收集和保存香港歷史文獻。目前已積累相當的數量，特別是在商業文獻方面，數目最為可觀，其中以商業賬簿、年結、書信最具特色。如表一所示，這批為數以千計的賬簿有來自金山莊、匯兌莊、批發和零售店、工廠等，反映華商的資本規模，多屬於中小型企業。

表1：香港大學圖書館特藏部收藏的賬簿

| 商號 | 行業 | 賬簿涵蓋年份 | 賬簿冊數 |
|------|---------|-----------|-------|
| 華英昌 | 金山莊 | 1899-1952 | 124 |
| 余仁生 | 中藥零售和匯兌 | 1914-1986 | 1680* |
| 聯益行 | 中藥批發 | 1926-1986 | 1816* |
| 張進記 | 魚絲莊 | 1931-1941 | 18 |
| 瑞英昌 | 零售店 | 1935-1941 | 8 |
| 中光布廠 | 布廠 | 1935-1958 | 66 |
| 黃貞菴 | 藥廠 | 1953-1979 | 25 |
| 華南印務 | 印刷廠 | 1956-1959 | 10 |
| 福安 | 京菓海味店 | 1960-1968 | 23 |

*包含年結

除賬簿外，還有各種收據、票據、書信和其他相關的文字紀錄，都可呈現商業流程中每一個步驟的內容。至於華商在交易之間所牽涉的信用和關係，往往都可在每一個相關環節的商業契據中查考出來。相對於政府保存的檔案，這批商業史文獻更能反映香港的民間經濟和社會生活。

這批文獻，大部份購自港島摩羅廟街的舊貨買賣市場，而有小部份由個別結業商號捐贈。目前，要收集戰前香港的商業文獻相當困難，深信這批珍貴的資料，將成為研究香港華商經濟發展歷史的重要瑰寶。我們希望藉此展覽引起大家對香港華商歷史研究和保存本地商業史文獻的重視。有關詳細情況，請移步到圖書館一樓特藏部櫃台查詢，或致電：28592207；電郵：specol@lib.hku.hk。



現在保存的香港中式賬簿中以余仁生的數目最多和最完整

撰文：李培德博士

三、華商資本的流動——會、股、息、債、匯

香港作為英屬殖民地，華資和英資涇渭分明，相對於英商來說，華商的資本規模遠比英商為小，資本多來自個人儲蓄和抵押，積累過程需時。不過，由於香港獨特的經濟環境，為亞太地區人、財、物、資訊流通的樞紐，華商對資本的流動，自有一套的看法，為求資本的價值最大化，在轉變資本為股、債、息、匯方面，表現最為特出。

作為最原始和古老的民間集資方法，合會的歷史最為悠久，所謂義會、銀會、搖會、輪會、標會等，最早可追溯自唐代。其中，以標會(俗稱「做會」)在廣東最流行。標會的最大特色是「價高者得」，誰人出利息最多便可中標，奪得該期的會金。正如圖1所示，由華南公司、萬福公司、方富恭、萬益堂號、翠香號、伍燭學、寶昌泰號、李文啟、劉希溪、陳明贊、公昌和號、萬春華號合組的標會分十二期，從1937年1月開始，每月12日開會，每期會銀200元，首期稱「番面銀」300元。全部供滿，可得總數不多過2500元(因要減去所付利息)的會金。由於標會利息不高，大概為三至四釐，最高一分，與之私人借貸月息高至三至四分相比，可謂十分化算，因此大受歡迎。不過，標會可謂完全對人信用，會首的責任非常重大，會眾無不希望「以義起而以信終」。

圖1：香港民間合會的會簿，內中所指的「龐公」為龐德公，後漢時代人。



每次開會的用餐費稱「辦東銀」，從會金中扣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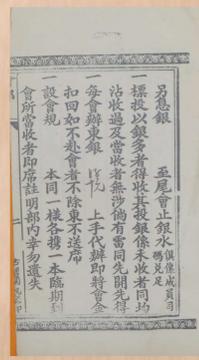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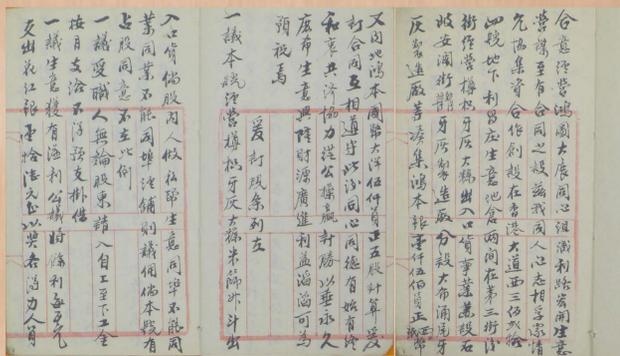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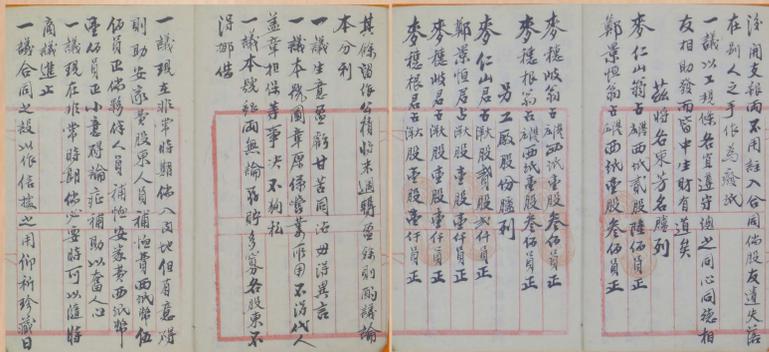


圖2：鄭景恒與人合股的利昌莊米舖「合股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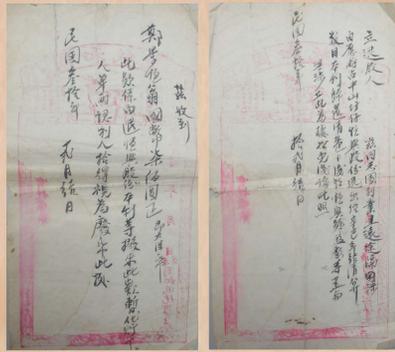


股東進入內地工作如遇意外可獲賠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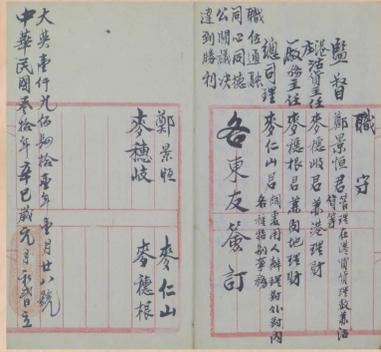


華商在港經營生意，大多以合股形式進行。在一般的合股書中，多會訂明股東姓名、出資金額、所持股份數目、股東責任範圍等等，至於破產和清盤等問題，則並無說明。舉例來說，由鄭景恒、麥仁山、麥穗岐、麥穗根四人於1940年合股位於西環的利昌莊米舖，分五股，每股300元。合股書上訂明每年派週息一分，如有盈利，則分派花紅每百元得十元，即一分。股東如退股，須於一個月前通知。股東不可做私幫生意，所謂「同埠不同業，同業不同埠」，免得大家惡性競爭。(見右圖2)鄭景恒善於投放資本，在利昌莊只佔一般，股本300元，同年，鄭景恒從內地中山墟仔另一合資恆興號退股，得本利共法幣七百元(見圖3)。

圖3：鄭景恒從中山恆興退股的聲明書和收款字條



股東的職責範圍有明確的界定



和西方商業習慣不同，華商合股可獲官利和紅利。同時，以勞力出資亦可成股，稱為「身股」、「力股」或「人股」。官利是無論生意盈虧都可獲得的利息，而紅利則按股東之同意分配該清賬期之盈利，通常是三年或以上。舉例來說，廣生行股東吳金群於1933年9月持20股，價值2000元，收官利和紅利合共120元，為本金六釐之回報。廣生行雖然是化妝品生產商，但同時開設存放款業務，從現存的「貯款單」來看，包括所給利息、存款期、提款條件等，都可因應市場的變化而靈活變通。例如，1930年3月，梁喜男存入300元，月息三釐，可隨時取還，但到1938年10月則改為月息一釐，該款直到1939年11月始停止續存；1932年5月，陳長亨存入1500元，月息二釐，可隨時取還，該款直到1939年10月始停止續存；1937年12月，周樹初存入3000元，訂明免息，不過可隨時提取。（見下圖4）

圖4：廣生行的「貯款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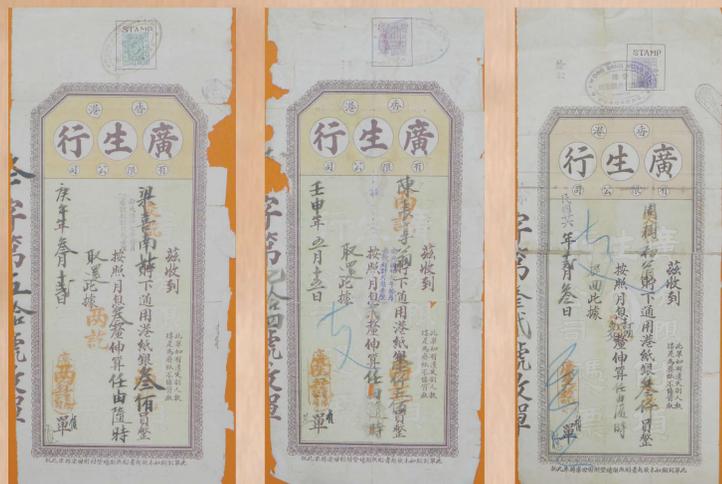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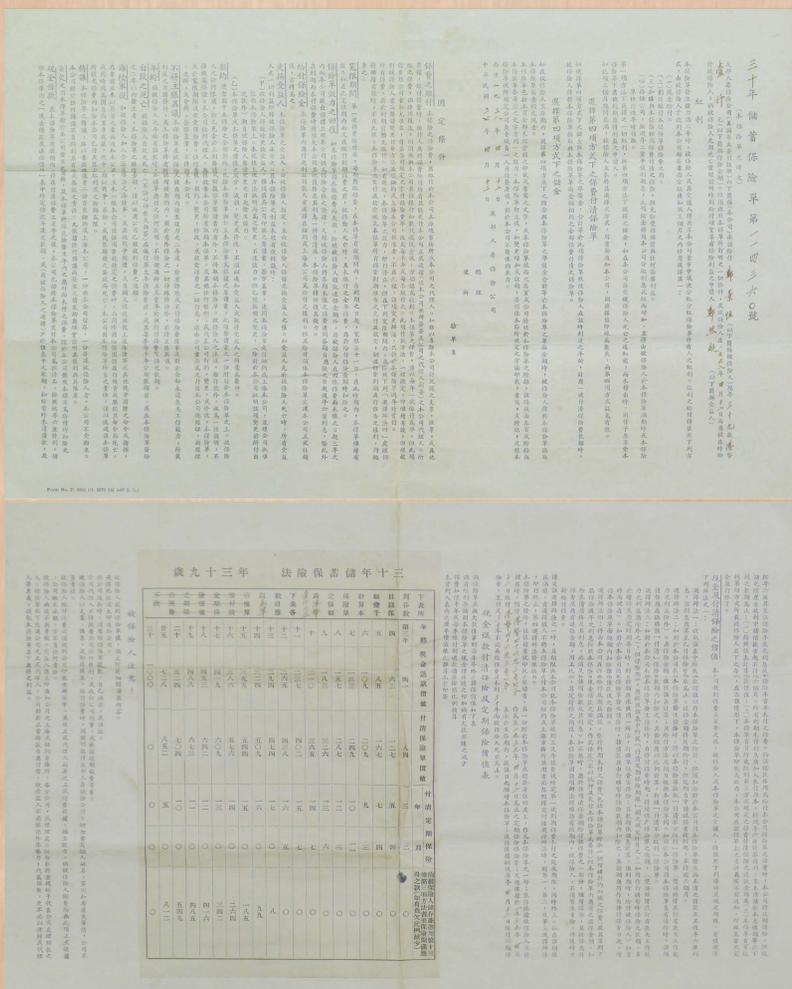


圖5：鄭景恒於1938年向美國友邦人壽保險公司買入為期30年的儲蓄人壽保險單



上述鄭景恒除投資利昌莊米舖外，更分別於1938和1941年向美國友邦人壽保險公司(Asia Life Insurance Company)買入兩份為期30年的儲蓄人壽保險單，第一份保額1000元，每年供款46.37元，第二份保額2000元，每年供款94.88元。人壽保險儲蓄供款可得年息六釐的增長，而紅利如不提取的話，亦可有三釐半的回報。（見圖5）鄭景恒除投資於人壽保險外，更有一份中央儲蓄會儲金單，不過供款不多，只有3元。

從目前保存的賬簿資料來看，香港華商亦投資於內地發行的公債，其中以鐵路債券最多，如粵漢鐵路（見圖6和7）和最受台山商人支持的新寧鐵路。新寧鐵路從1905年起興建，進入1930年代出現虧蝕，到1935年更陷入破產邊緣。一般而言，鐵路債券都會有五釐或以上的回報。況且，鐵路債券都有內地政府支持，香港華商要與內地政府維持關係，投資有政府背景的公債當然是不二之選。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廣生行、聯益行、余仁生、乾泰隆、華英昌，都設有存放款業務，可見香港華商對吸納資金之重視。至於在匯款業務方面，像余仁生、乾泰隆、華英昌賺取匯款的手續費，通常是2%，但真正的利潤不在於手續費而在於匯水，把收到的外匯於適當時候出售。從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中，世界銀價出現巨大變動，為懂得投機的商人帶來巨額利潤。此外，積存的匯款可幫助短期融資，對同時開設匯款和進出口業務的商人來說，提供更大的資本能力。香港華商像余東璇、馬敘朝把在匯款業務賺到的利潤轉投於地產，大大提高資本的增值。

圖6：香港華商馬敘朝在香港代售粵漢鐵路公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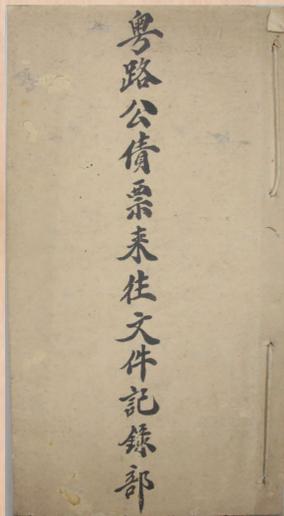


圖7：粵漢鐵路公債（李培德個人收藏）



四、乾泰隆

乾泰隆是目前香港仍然運作的「南北行」老字號，由潮州饒平縣前溪村（今屬澄海縣）人陳宣名、陳宣衣兄弟於1851年創立，距今已有160年歷史。乾泰隆由最初經營大米出入口、船運、匯兌，到保險、錢莊、火壟（精米廠）、貨棧，發展成一多元化的綜合型企業。

乾泰隆成功的原因，主要在於發展一跨地域的「聯號」網絡，包括：1871年於曼谷設立的陳豐（粵音「洪」）利號、1885年於新加坡設立的陳生利號、於汕頭設立的陳萬利號、於西貢設立的乾元利等，形成一個所謂「香↔叻↔暹↔汕」的貿易樞紐。聯號的作用，不僅在於提供更多的貿易機會，同時在「聯財」和「聯人」方面，亦發揮擴大企業規模的重要作用。1932年，受世界經濟大蕭條影響，與乾泰隆經營相同業務的元發行宣佈倒閉，乾泰隆能夠幸免於難主要因為它的跨國聯號網絡、多元化的經營策略和強大的族群支持。

作為地緣性和血緣性強的家族企業，乾泰隆與家鄉饒平縣關係密切，除購置大量田產、房產外，亦從家鄉得到大批的勞動力。1933年，乾泰隆重整股本結構，由原來的十一股增加為十六股，標誌着陳宣名一支勢力之消退，而另一支以陳慈豐（陳宣衣長子）為首的勢力抬頭。此外，本來由香港主導的「香↔叻↔暹↔汕」貿易網絡亦逐漸由曼谷所取代。

1975年，乾泰隆註冊為有限公司，總資本為港幣5 645 800元，分564 580股，每股十元，規定不能將股份轉讓予外人，同時女性族人不得持有股份（這規定於1988年取消）。當時，陳慈豐家族佔有絕大比數的股份。由陳慈豐在曼谷創辦的陳豐利號，目前已成為泰國知名的華商企業。作為聯號企業，乾泰隆多利用曼谷陳豐利棧所提供的匯兌服務，把資金於聯號網絡內運轉。右圖1顯示的多張由曼谷陳豐利棧發出的匯票，收款人多為寄款人於香港或汕頭的聯號，例如圖2展示1928年曼谷的和合祥，匯給汕頭的和合祥4000元，陳豐利棧除收取手續費外，還可得到匯價方面的利潤，當然亦可藉此觀察大筆資金在區內的流動方向。有趣的是，圖3由曼谷的泰萬昌匯給香港的泰怡昌3000元，該票上蓋有：「此票係汕泰豐昌訂交香炳隆昌取他號不准支取」字樣，表示該票已流入汕頭，但最後仍由香港清算，匯款資金極可能在結算前被利用，華商懂得利用匯款造成的短期信貸，解決融資問題。



圖1：陳豐利棧發出的匯票



圖2：曼谷的和合祥匯款給汕頭的和合祥（李培德個人收藏）



圖3：曼谷的泰萬昌匯給香港的泰怡昌（李培德個人收藏）

五、余仁生

很多人都會以為余仁生是香港中藥的老字號，由余氏家族於淺水灣(稱Eucliffe)、般含道(Euston)和大埔(Sirmio)建造的「余園」堡壘式建築，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余仁生於1879年由來自廣東佛山移民余廣培於馬來亞創辦，最初為雜貨店，稱「仁生」，直到1920年代才改稱「余仁生」。從表一可見，余仁生於中藥所得的收入遠比匯兌業務為少。

表1：余仁生於經營中藥和匯兌的生意額(港幣)

| 年份 | 中藥材 (利潤率) | 匯兌 |
|------|--------------|-----------|
| 1929 | 55 288 (41%) | 1 826 036 |
| 1931 | 71 507 (37%) | 2 833 619 |
| 1933 | 68 082 (36%) | 701 709 |
| 1935 | 44 884 (27%) | 3 214 036 |

余仁生最早的崛起，與英國統治馬來亞有密切關係。在余東璇經營的年代，余仁生的利益可謂與英國統治者是一致的。余東璇不僅取得錫礦的開採權，同時以包稅制的形式大量種植樹膠。1911-1920年期間，余東璇更被委任為馬來亞聯邦四州府議事局華人代表，其後更獲頒O.B.E.勳銜，以表彰他對發展馬來亞經濟及領導華人社會的貢獻。

進入1920年中期，馬來亞經濟開始萎縮，余東璇看準錫礦和樹膠業將進入衰退期，他一方面收縮這方面的業務，另一方面卻大事擴展在馬來亞與中國間的匯兌業務。1928年，余東璇毅然決定移居香港，並開始投資地產，在香港遙遠控制於新加坡和馬來亞的生意。1932年1月，余東璇在新加坡成立余東璇有限公司，資本額達三千萬叻幣，由他本人和兒子佔有大比數股份。不過，當余東璇於1941年5月逝世，分隔新、港兩地的兒子開始分裂，為日後家族內部不和埋下伏線。

於1932和1933年期間，余東璇將近300個於新、馬、港購得的土地和物業轉讓給余東璇有限公司，總值港幣約一千萬元。1941年時，僅是在港物業的租值已達45萬元，余東璇因而被稱為「地產大王」。余氏的物業多集中港島多個地區，包括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西、干諾道中、干諾道西、德輔道西、文咸東街、永樂街、般含道、山道、黃泥涌道等(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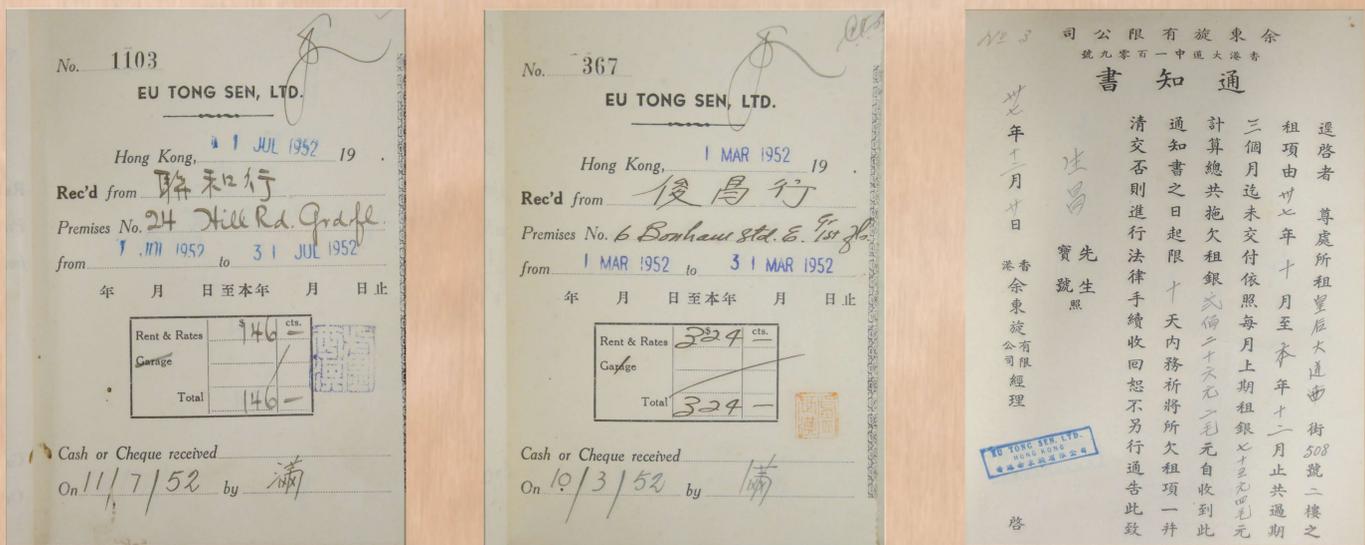


圖1:余東璇有限公司在港島不同地區的租務紀錄

余仁生能夠大量購置物業，主要因為匯兌業務之急速膨脹，余東璇利用在匯兌所得的利潤大量添置房地產。香港大學圖書館目前保存的余仁生賬簿數量最多和最完整，大概分省城余仁生、香港余仁生(藥號)和香港余仁生(匯兌)三大類，下分日清、各號往來、各埠往來、雜項、附項、總簿各小類，在總簿下再分月結、年結和全盤。這批為數一千多卷的賬簿最大特色是採用中式會計法，登記用的蘇州碼亦與西式阿拉伯數字不同(見圖2)。中式會計與西式會計比較，雖然有多處不足的地方，但能夠滿足余仁生於匯兌業務上的需要和解決各分號間的資金調撥問題，所以一直沿用至1979年。

表2：余仁生賬簿上使用的蘇州碼和阿拉伯數字比較

| 阿拉伯數字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
| 蘇州碼 | | | | ㄨ | ㄨ | 一 | 一 | 三 | 文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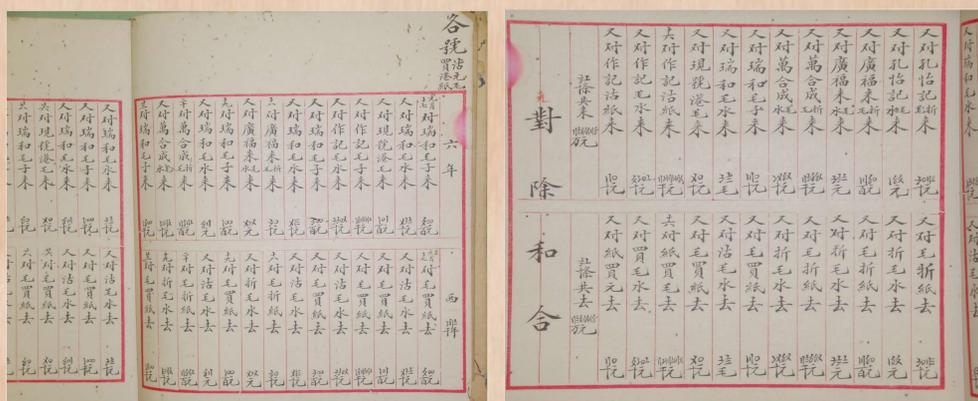


圖2:余仁生賬簿採用的中式數字蘇州碼

六、華英昌

華英昌是香港著名的金山莊，由陳姓台山商人於上環德輔道中290號創立，具體創辦年份已無從稽考，大概於十九世紀末。由於美國和澳大利亞分別於1848年和1851年發現金礦，隨後掀起一陣陣的尋金熱潮，香港的金山莊受惠於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海港、交通設施，吸引大批包括來自台山、廣東和其他各處的中國勞工到港，為到「金山」和「新金山」尋金作準備。據統計，於1869至1939年期間，共有大約八百萬的中國人經香港離開中國。由於金山莊能夠向這些特別是在北美的移民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家鄉物品、傳遞家書、辦理匯款等，金山莊一度興旺起來。從1870年代的三十多家，到1920年代已猛增至近三百家。

金山莊的業務幾乎和南北行無異，對香港成為轉口貿易中心貢獻很大。金山莊除經營一般貨物的進出口外，還代辦匯款和華工出國，充分發揮了「人、財、物」流通的功能，是為金山莊業務的最大特色。由於中國勞工多目不識丁，金山莊能夠為他們購買船票、進行健康檢查、申請出國文件，甚至可安排在香港住宿兩至三星期，為等待船期或得到出國證件作準備等，提供一條龍服務(見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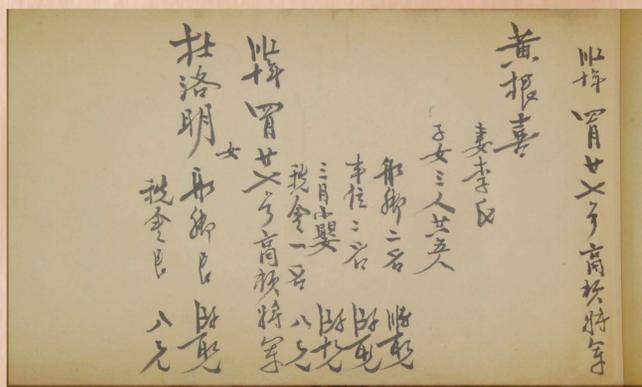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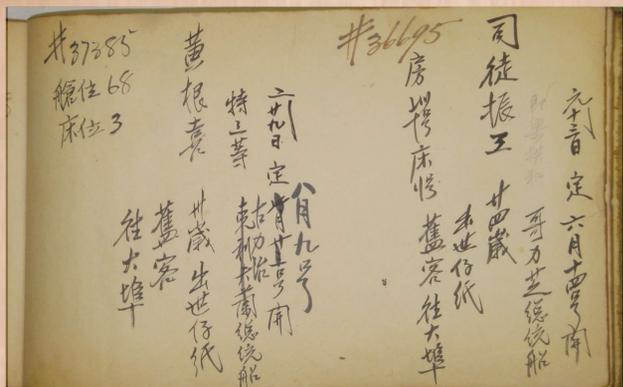


圖1：從「各客窩位部/各客寫船位部」紀錄中，可見華英昌有為華工安排乘船出國的服務

華英昌的聯號遍布北美各大重要華埠，包括三藩市、絡杉磯、西雅圖、波特蘭和紐約。在美國的聯號通常會先收集一定數量的匯款訂單，才會把款項匯去香港。在香港的華英昌會把收到的「艮紙」(英文支票cheque的諧音)拿去銀行兌現，在扣除手續費後，便會要求在台山的聯號發送匯款。華英昌所得的利潤並不僅在於手續費，而是根據匯價變動而適當地出售「艮紙」。

現存華英昌的賬簿從1899年開始，直到1952年為止，共有一百多冊。華英昌的賬簿不僅是會計的紀錄，同時也會記入匯款人所託「銀信」(指匯銀和書信)的詳細內容，稱為「各客附寄部」。華英昌更接受華僑存款、借款、託管資產等，說是民間銀行亦不為過(見圖2)。

1939年，進入廣東的僑匯總額達一千二百多萬元，其中有七成的匯款是通過金山莊轉匯的。不過，在抗日戰爭期間出現了來自大型銀行如中國銀行和廣東銀行的強勁競爭。到了二次大戰結束，韓戰爆發，香港的轉口貿易受到打擊，亞太地區的「人、財、物」不再自由流通，金山莊亦開始步入式微。



圖2：華英昌代辦匯款之賬簿「各客附寄部」

七、馬敘朝

馬敘朝(見圖1)，1878年出生於廣東省台山縣白沙墟塘口村，經營公有源綢緞莊、昌華有限公司。此外，又投資四邑輪船公司和新寧鐵路。1912年，馬敘朝與同鄉利希慎、馬持隆共同斥資20萬元，組成裕興公司，向香港政府投得超過100萬元的鴉片經營權。1910年代，與李星衢合資創辦中國康年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及中國康年儲蓄銀行(見圖2)。1925年，與盧根合資經營皇后戲院。1932年，與羅旭和、周竣年、顏成坤、雷蔭蓀、陳廉伯等合資於赤柱興建和樂村。

1920年代可以說是馬敘朝事業的頂峰，除經營生意以外，亦活躍於社團和社會公益事業。1924年，馬敘朝出任保良局總理(1928年當首席總理)，1925年任東華醫院主席，其後任華商總會幹事值理、四邑商工總局理事、台山商會董事。馬敘朝是殖民地香港典型的華商代表，一方面與殖民地合作，另一方面又支持內地中國政府。1914年，獲國民政府四等嘉禾章，1937年為中國建設運動會廣東省分會委員。1925年，獲香港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1926及1929年出任團防局紳，1953年英女皇加冕紀念獎章。馬敘朝雖然於內地出生，受傳統教育，但他善於吸收西方的商業知識，充分利用香港作為英屬殖民地的優勢。在政治上，與現政權的統治機構融合，在經濟上大量利用西方的投資工具如銀行、保險、航運、倉庫、鐵路等等。

香港大學圖書館目前保存的馬敘朝文書，內容十分豐富，涵蓋馬敘朝個人於社會和商界的活動、營商和投資的紀錄、與親友的來往書信等(見圖3和4)。從這批資料可以見到，馬敘朝是一個成功的投資家，他善於締造一個以香港為基地，橫跨內地和南北美洲的台山商業網絡。馬敘朝為台山同族、同鄉出謀獻策，一方面通過匯款和存款吸納他們的資金，投資於地產、債券和外匯，另一方面向他們提供移民、經紀等仲介代辦服務。(見圖5至7)



圖1：馬敘朝肖像



圖2：由馬敘朝投資的中國康年儲蓄銀行、人壽保險和水火保險公司聯合刊登廣告



圖3：馬敘朝為族人投資不同公司，他經常收到代購股份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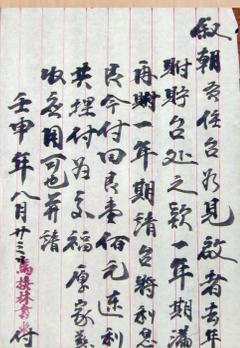


圖4：1932年馬敘朝收到族人繼續存款和調動利息的要求



圖5：馬敘朝的租項簿



圖6：馬敘朝有大量的物業供出租投資，且紀錄巨細無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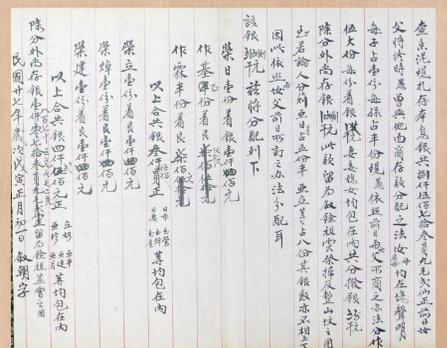


圖7：馬敘朝為族人執行遺囑

八、廣生行

廣生行是香港老牌化妝品生產和銷售商，於1905年由馮福田、林壽廷、梁澤周合資設立，1910年註冊為有限公司，資本為港幣20萬元，至今已有超過一百年歷史。

廣生行最成功的地方，是把被視為奢侈的化妝品平民化。當時香港的化妝品多從歐洲進口，僅為富家小姐或外籍婦女所享用。廣生行生產的花露水、粉底霜、雪花膏、茉莉霜、爽身粉、千日香、如意膏、美髮霜、牙膏、生髮油等，由於價格相宜，廣受香港的普羅市民歡迎。進入1920年代，廣生行的資本增至120萬元，分行遍設中國各大城市，包括：上海、南京、天津、北京、濟南、營口、大連、長春、哈爾濱、瀋陽、佛山、石岐、江門、廣州、梧州、福州、漢口、蘇州、開封、澳門。（見圖1）

廣生行最大的經營特色，莫過於對產品的包裝和宣傳策略。廣生行於1912年起，自設生產玻璃瓶樽的工場，又開設點石五彩印刷所，印制專門設計的廣告海報、月份牌、小冊子、標籤等各種宣傳用品。1919年，又創辦《致中日報》，推廣多達三百餘種的旗下產品。廣生行的商標「雙妹嚙」，風行香港、中國內地、東南亞和北美華人社會，這和廣生行有效的宣傳策略有密切關係。不過，卻惹來不少中外商人去假冒，其中以生髮油和花露水最為嚴重，廣生行不得不應付這方面的侵權官司，以禁止贗品的流存。香港大學圖書館現在保存不少有關廣生行商標註冊的文件（見圖2和3），可見商標作為企業資產之被重視。廣生行的商品能夠風行中國內地，除有效的廣告宣傳外，妥善和良好的代理制度亦起到重要之作用，相關的代理合約原件，目前仍可找到。（見圖4）

廣生行並非僅是化妝品生產商，它的業務還包括接受存款和貸款（見圖5），反映其對吸納流動資金之重視。1941年10月，廣生行正式在香港股票交易所掛牌，象徵其股票可以公開買賣的同時，廣生行亦可於股票市場上籌集資金。1970年，廣生行開始涉足本港的地產行業。1989年，作為廣生行最大持股人的馮氏家族開始退出經營，由百富勤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收購三成股權，從此廣生行的家族經營特色逐漸消失。不過，「雙妹嚙」的商標一直沿用至今。



圖1：廣生行於內地開設店舖內觀，牌匾上寫：「雙妹老牌，化妝妙品」



圖2：廣生行於1911年獲日本政府認可的「雙妹嚙」註冊商標



圖3：廣生行於1924年獲中國政府頒發「雙妹嚙」牌商標註冊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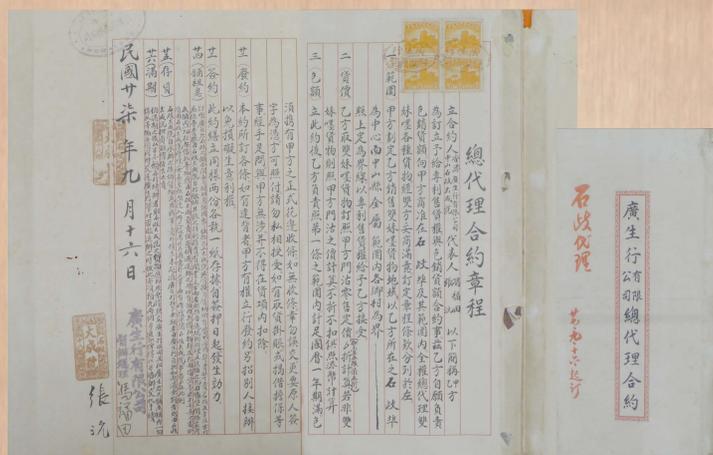


圖4：廣生行於內地廣設分銷網，與代理商號簽訂相關代理合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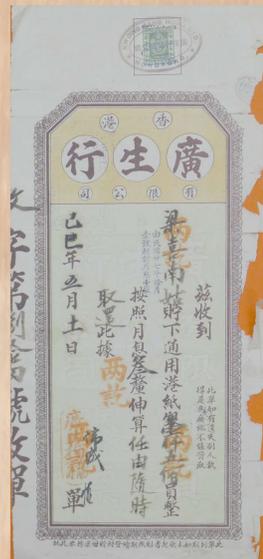


圖5：廣生行豈非化妝品生產商般簡單，它還提供存借款服務

九、總結

香港雖然於1841年開埠，但華商資本的積累，要到二十世紀初才完成。由英商在亞太地區主導的金融資本主義亦逐漸在香港植根，香港華商雖然經過較長的資本積累過程，但亦不甘示弱，在二十世紀初陸續開設銀行、保險公司、貿易行、倉庫等，經營貿易、地產、百貨等不同行業。1920年代可以說是香港華商的黃金時期，華商資本不僅在香港紮根，更延伸至中國內地及海外各大華人社區。香港華商為中國內地籌集資金，更多至億元計，海外華僑匯款到中國，大多先經過香港。主要原因不僅在於香港有完善的金融設施、外匯市場，更在於資金來到香港還可以投機、增值。不過，進入1930年代，隨世界經濟結構之轉變，華商因過份投機而倒閉的亦大有人在。相反，能夠實行多元化經營，增大資本的規模，便能渡過難關。

香港能夠成為亞太地區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華商所走過的崎嶇道路有助我們對香港經濟歷史有更深入的認識，而商業文獻往往能夠提供重要的線索。

圖1：有不少港人參加的中央儲蓄會，該會由中央信託局發起，採零存整付形式（李培德個人收藏）



圖2：上海永安公司得到不少港人投資，在日治時期股份仍然通用，不過公司註冊地則有所更改（李培德個人收藏）

圖3：由台山縣政府發行的公路股票，回報率有24釐之高，得到在港四邑商人的支持，成功吸納香港不少資金（李培德個人收藏）



| 年次 | 核發股數 百十元壹分 | 支付時 | 股款人簽字 | 年次 | 核發股數 百十元壹分 | 支付時 | 股款人簽字 |
|-----|---------------|-------|-------|-----|---------------|-------|-------|
| 一八年 | | 年 月 日 | | 二八年 | 10 | 年 月 日 | |
| 一九年 | | 年 月 日 | | 二九年 | | 年 月 日 | |
| 二〇年 | | 年 月 日 | | 三〇年 | | 年 月 日 | |
| 二一年 | | 年 月 日 | | 三一年 | | 年 月 日 | |
| 二二年 | | 年 月 日 | | 三二年 | | 年 月 日 | |
| 二三年 | | 年 月 日 | | 三三年 | | 年 月 日 | |
| 二四年 | | 年 月 日 | | 三四年 | | 年 月 日 | |
| 二五年 | | 年 月 日 | | 三五年 | | 年 月 日 | |
| 二六年 | | 年 月 日 | | 三六年 | | 年 月 日 | |
| 二七年 | | 年 月 日 | | 三七年 | | 年 月 日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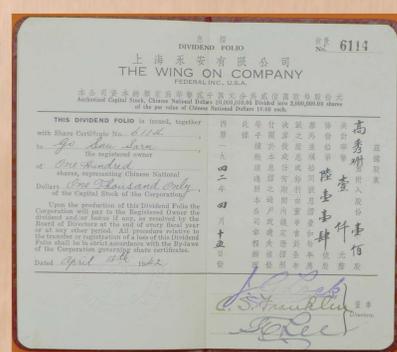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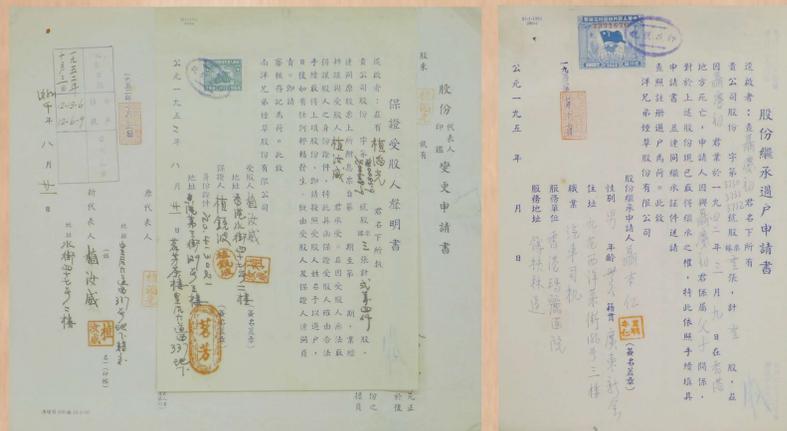


圖4：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在內地發行的股票同樣受香港投資者歡迎，在實行公私合營前，香港的股東仍可領取股息（李培德個人收藏）



參考文獻：

James Hayes, "Collecting shop and business papers in Hong Kong," in Alan Birch, Y.C. Jao and Elizabeth Sinn (eds.), *Research Materials for Hong Kong Studies*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4), pp. 47-55.

濱下武志〈傳統社會與庶民金融——新加坡、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合會」與「銀信匯兌」〉，《一九八五年華僑華人歷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所，1985年），頁64-73。

濱下武志〈清末民國期、華中に於ける於合股・合夥契約文書〉，《中國朝鮮文書史料研究》（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6年），頁33-62。

Takeshi Hamashita,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and Asian Banking History," in Olive Checkland, Shizuya Nishimura, and Norio Tamaki (eds.), *Pacific Banking, 1859-1959: East Meets West*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4), pp. 52-60.

Choi Chi-cheung, "Competition among brothers: the Kin Tye Lung Company and its associate companies" in Brown, Rajeswary (ed.)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1995), pp. 96-114.

蔡志祥〈從遺囑看近代潮汕家族企業的發展：以香港乾泰隆—曼谷釐利陳氏家族為例〉，《香港研究資料叢刊》創刊號（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頁70-79。

Lee Pui-tak,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New Busines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Rajeswary A. Brown (ed.),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Vol. I*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453-80.

Lee Pui-tak, "Chinese Merchants in Hong Kong Colonial Context, 1850-1910," in Wong Siu-lun and Toyojiro Maruya (eds.), *Hong Kong Economy and Society: Challenges in the New Era*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Tokyo, 1998), pp. 61-86.

李培德〈一九世紀香港廣東商人的商業ネットワーク〉，飯島涉主編《華僑華人史研究的現在》（東京：汲古書院，1999年），頁152-184。

Stephanie Chung, "Doing business in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ern China: booms and busts of the Eu Yan Sang business conglomerates, 1876-1941," in Leo Douw, Cen Huang and David Ip (eds.), *Rethinking Chinese Transnational Enterprises: Cultural Affinity and Business Strategies* (Richmond: IAS/Curzon, 2001), pp. 159-183.

David Faure & Lee Pui-tak (ed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Econom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David Faure, *China and Capitalism: A Hist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李培德〈再論香港的企業史研究〉，《信報財經月刊》第372期（2008年3月），頁98-103。

科大衛著《近代中國的商業發展》（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